



中国经济和谐发展论丛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 行为选择与市民化

刘传江 董延芳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和谐发展论丛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 行为选择与市民化

刘传江 董延芳 著

本书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批准号：7097309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城镇化战略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批准号：10CJL035）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985工程”和“211工程”专项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基于中国乡城劳动力“二阶段转移理论”和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重点探讨两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受制度性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在劳动供给行为方面出现的不同,及其和迁移流动行为、身份定位行为交互影响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测量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数理模型和指标体系,测量和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以此提出促进其市民化进程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关注中国“三农问题”、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及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政府部门、学术界人士和研究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 / 刘传江, 董延芳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中国经济和谐发展论丛)
ISBN 978-7-03-039396-6
I. ①农… II. ①刘…②董…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9828 号

责任编辑: 马 跃 / 责任校对: 黄江霞
责任印制: 阎 磊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3/4

字数: 196 000

定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经济和谐发展论丛编委会

主编：刘传江 杨艳琳 刘洪辞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林 成德宁 刘传江 刘洪辞 杨 玲
杨 冕 杨艳琳 余 江 姚博明 董延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 35 年的高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规模，还是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较大甚至多倍的增长或者提高。这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改革红利”，得益于由改革开放所引致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贸易红利”。这些“红利”均来源于经济增长。但是，粗放型增长给中国经济埋下了大量隐患，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逐步下降，不仅是技术性增长下降，而且是制度性增长下降，这使经济增长的“红利”也随之下降，部分领域出现增长的“副利”或者“负利”。

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和谐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日趋严重。这迫切需要中国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早在 1995 年 9 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未来 15 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按照官方文件的解释就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以及使用方式的改变，一般是指由外延型、数量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型、质量型、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2007 年 11 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改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主要内容：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此可

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转变。官方提法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不过,上述认知依然“只是在同一窗口换一角度看风景,视野必然受到窗口位置及大小的限制”。换言之,基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深层次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2010年是1995年提出15年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收官之年”,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特征并未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原因固然很多,仅从认知和政策层面看,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但“发展视角”没有同步从工业文明的“老窗口”转换到生态文明的“新窗口”,即没有明确主张实现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转型。而实践也已证明,工业文明框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能使中国“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革命性的转变并实现和谐发展的愿景。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和深层次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基于生态文明发展方式范式的要求,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正确选择。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于1962年在其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做出系统阐述的,最初是指一种观念、理论和规律,通常是某一科学集团对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和遵从的行为模式,它规定了人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将“理论范式”延伸,用于刻画基于某种理念和规律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实践范式”及其相关的系列概念,如环保与经济的双赢范式、经济现代化范式、经济与社会发展范式、经济发展新范式、区域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产业范式、农业发展范式、消费范式等。国外也是如此,早在1982年,G.多西将这个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佩雷兹(C. Perez)在1983年发表于《未来》的论文《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结构变迁与新技术吸收》中又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与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1988年,著名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与佩雷兹又在合作发表的《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周期与投资行为》一文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2010年,日本京都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植田和弘(Kazuhiro Ueta)在西北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日经济·环境论坛演讲中也明确提出了发展范式(development

paradigm) 转换的概念。不仅如此,学术界还探讨了经济发展范式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乔臣认为经济发展范式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①经济发展范式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包括经济发展进程中研发人员的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基础;②经济发展范式研究的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包括对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发展范式的各种范例分析和系统表述;③经济发展范式的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或研究方法(analytical means);④经济发展研究人员所持有的共同的理论信念(theoretical faith)。当经济发展实践大大突破了已有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时,就需要对以往经济发展的诸多范例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从中提取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性内涵和实质并加以吸收和应用,结合实践要求提出新的经济发展范式。经济发展范式转换和选择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助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保障。

根据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研究员的两次现代化理论或文明发展理论,第一次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其发展范式即为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在该范式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主要特点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福利化、流动化、专业化,其产业特征是工业比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制造产业发达,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 GNP 和人均 GDP,该发展范式的最大副效应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消耗、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的代价。第二次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其匹配的发展范式是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在该范式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是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从物质经济走向生态经济,主要特点是实现知识化、信息化、绿色化、生态化、全球化、多样化,其产业特征是产业生态化、物质减量化、能源去碳化、经济服务化,还原产业发达,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生态效率($EEl = GDP / EFP$)和绿色 GDP。

现代文明与和谐发展目标不再是工业现代化,而是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生态现代化。因此,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仅仅实现工业文明“窗口”中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工业文明“窗口”走向生态文明“窗口”,实现工业文明经济发展范式向生态文明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型。中国近 20 年及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①工业文明“窗口”中的早期转变阶段,即从外延型、数量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型、质量型、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②工业文明“窗口”中的后期转变阶段,即从注重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以及使用方式向经济要素配置组合和结构优化并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③从工业文明“窗口”走向生态文明“窗口”的转变阶段,即从工业文明经济发展范式向生态文明经济发展范式转型。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六

个维度及其过程来描述：①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传统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②发展导向：追求产值→追求利润→追求可持续发展；③文明类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④支柱产业：黄色产业→黑色产业→绿色产业；⑤发展特征：粗放型经济→集约型经济→低碳型经济；⑥测度模型：O（output）模型经济→IO（input-output）模型经济→IOOE（input-occupation-output-emission）模型经济。

我们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型经济因其只计产出不计投入肯定是不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约型经济只关心企业利润而不考虑企业生产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因而其也是不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同时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低碳经济才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型经济。那么，为何以“3R”和非线性生产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不是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基本经济形态呢？应当说，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特征的循环经济，相对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为特征的单向线性经济是更接近于产业生态化要求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方向，是新型工业化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和手段之一，但它支撑不起一个国家或地球整个面上的生态化产业体系和生态文明。其主要原因在于：①循环经济包括“点”（企业）、“线”（产业）、“面”（园区）三个层次，层次越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越好，但循环难度也越大。②循环经济要同时满足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政策合法性三个条件，而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不够发达的地区通常不能够同时满足经济学意义上发展循环经济的上述三个条件，或者说循环经济不是一个普适性的经济概念。③循环经济的“3R”原则相对于低碳经济的“三低一高”（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特征，前者只是表征经济的形式和手段而不必然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结果，事实上，循环经济发展中通常面临规模不经济、循环不经济、循环不环保、循环不节约“四大问题”的阻碍；后者则是源头控制、过程控制、目标控制相结合的经济发展范式，这种“立体式”的技术经济范式体系是对循环经济的改进、深化和创新。发展低碳经济是基于人类社会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创新，它是追求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创建清洁能源结构的一种创新性和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是经济发展范式的创新，是世界经济发展低碳化趋势的客观要求和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低碳流通、低碳消费三个方面，它是比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更高的生态化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经济发展与能源危机之间矛盾，平衡能源、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换言之，低碳经济是支撑和实现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是中国“两型社会”的核心追求及和谐发展的具体

表达。

经济和谐不仅包括国内外经济和谐、国内各个区域经济和谐、不同产业和谐、不同企业和谐,而且还包括资源(能源)环境与经济和谐、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和谐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竞争下的市场均衡并不等同于经济和谐,而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更不能促进甚至损害经济和谐。因此,经济和谐既是市场和谐,也是技术和谐,更是制度和谐,是同时协调市场、技术、制度的综合和谐;它不仅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谐,更要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和谐;其不仅是在某一时点所实现的静态和谐,更是在变化过程中能趋于实现的动态和谐。可以说,经济和谐是政治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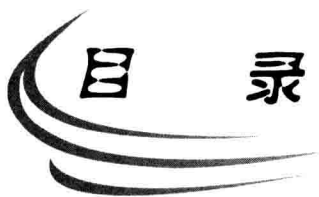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确保中国经济能够维持、延伸甚至扩大“改革红利”的现实选择。如果说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应遵循“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在现在和未来的深化改革开放中则应遵循“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最硬道理”。不断促进和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和谐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制约经济和谐、社会和谐、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短板问题”、“瓶颈问题”。只有基于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发展范式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实现“协调式”和“包容式”的和谐发展,才能维持和延伸甚至扩大“改革红利”,改善全民的“帕里托效应”,增加全民的福利,才能让全民进一步分享“改革红利”。只有促进与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才能将“改革红利”转变为持久的“和谐红利”,让全民充分分享“和谐红利”。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拥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以及产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三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聚焦点是: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为背景,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系统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①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②城乡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和谐发展问题;③产业结构特征升级过程中的和谐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围绕上述三大研究领域先后申请获批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含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30余项,同时还承担了其他部省级项目、国家合作项目、地方政府及企业委托和招标项目60项。列入中国经济和谐发展论丛的各部著作,都是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学术团队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它们是各自课题组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天联集团重大科研课题等资助下,经过数年系统、深入地研究上述重大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和战略对策的成果。例如,刘传江、董延芳的著作《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是作者所做的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主持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刘洪辞的著作《蚁族群体住房供给模式研究》是江苏天联集团重大科研课题资助研究“蚁族”群体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余江的著作《对外贸易与中国能源消耗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杨艳琳的著作《中国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杨冕的著作《节能减排政策研究》和杨玲的著作《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绩效研究》也是各自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受时间和水平的限制，中国经济和谐发展论丛还存在诸多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 21 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参考层面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引发学术界对上述问题展开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刘传江 杨艳琳 刘洪辞

2013 年初夏于武昌珞珈山



总序

第 1 章 绪论	1
1.1 现实背景与理论研究	1
1.2 本书的选题价值、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	4
第 2 章 乡城劳动力转移“中国路径”上的农民工	10
2.1 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	10
2.2 “中国路径”转移中的农民工代际分化	21
第 3 章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劳动供给	32
3.1 农民工的过度教育与收入效应	32
3.2 就业困境原因与市场三方分析	37
3.3 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及市场效应	44
第 4 章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行为选择：迁移流动	49
4.1 改革开放以来乡城劳动力转移格局的巨变	49
4.2 两代农民工不同的流向决策与隐性户籍墙	53
4.3 隐性户籍墙再探析：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	59
第 5 章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行为选择：身份定位	65
5.1 农民工的“被边缘化”与“自边缘化”	65
5.2 农民工身份定位的数理分析	69
5.3 农民工身份定位的实证研究	75
5.4 农民工的生存职业困境、空间地域流动与社会阶层固化	79
本章附录：推导过程与数学证明	81

第6章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评价与分析	84
6.1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评价的基本问题	84
6.2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评价的基本框架	93
6.3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评价的实例	103
第7章 推进新时期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117
7.1 农民工有序市民化是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终结	117
7.2 打破循环陷阱应重点突破的制度性障碍	119
7.3 新时期农民工有序市民化促进工作的目标、重点和原则	124
7.4 促进新时期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政策措施	126
参考文献	135
后记	141



绪 论

1.1 现实背景与理论研究

1.1.1 农民工分化的社会背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松动，长期积累的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规模庞大的乡城劳动力转移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非常特殊的“中国路径”，表现为上述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此转变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为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此转变目前仍步履维艰。如果该状况持续下去，即数以亿计的农村流出转移劳动力长期滞留处于城市边缘地位，也就是大量农民工不能实现市民化，不仅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还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乃至障碍。为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和谐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不同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在个人特征上出现了显著差异。这导致市民化进程中，他们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意愿，产生不同的行为，尤其体现在劳动供给、迁移流动和身份定位方面。在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作用下，这三者相互影响，形成农民工“生存职业困境—空间地域流动—社会阶层固化—生存职业困境”的双向循环，进而对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带来综合影响，挑战现行体制与相关制度安排。为此，本书特别关注的焦点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面对两代农民工在个人特征及行为选择上出现的代际分化，如何完善现行的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体制和制度安排？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回流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给政府建立、完善和加强公共治理体系提出了客观要求。

1.1.2 研究文献简评

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有利于政府顺应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的大趋势,建立、完善和加强公共治理体系,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进而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对于该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不足依然存在。有关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和市民化,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个人特征,即分析第一、二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和未来预期等方面存在的异同;②行为选择,即在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两代农民工各自流动的原因和基于社会角色的不同决策;③社会影响,即分析第二代农民工行为选择造成的社会问题,包括“民工潮”、“民工荒”和“问题农民工”等;④政策建议,这一点内容庞杂,涉及社保、维权和教育等各个方面,近期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再就业对策的应急研究。

从总体上看,现有的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在其个人特征的分析上已经比较系统,同时,就他们行为选择造成的社会影响方面,许多学者也给予了详尽的描述。但是,就上述四方面中的行为选择而言,现有的很多相关研究都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而是仅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叙述之上,并且由于相关数据较少,大部分研究都是泛泛而谈,缺乏实证支持,这不符合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同样,在政策建议方面,“现状—问题—对策”这种三段论式的简单文章也层出不穷,至于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再就业对策的相关研究,也很少从市民化角度提出长期战略思路。

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符合经济学研究规范的相关文献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依然存在。研究者们大多沿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没有注意到发展经济学关于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实际上并不能对“中国路径”的乡城劳动力转移做出充分解释。例如,唐纳德·博格(Bogue, 1969)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虽然能从宏观上大致说明人口流动的原因,但不能细化到微观层面;阿瑟·刘易斯(Lewis, 1954)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剩余劳动无限供给模型(unlimited supply of surplus rural laborers under dual economy)虽能较好地解释“中国路径”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但忽视了农民个人特征等重要因素的影响;迈克尔·托达罗(Todaro, 1969)的迁移预期收入理论(expected income of migration)从一般层面抽象考察了就业概率对乡城劳动

力转移的重要影响,但就中国实际看,就业概率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影响就业和就业机会均等的深层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其理论中并未涉及;伊沃里特·李(Lee, 1966)的乡城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理论(determinants theory of rural-urban migration)较之前述理论有所深入,但终究没有对影响乡城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作具体解释,至于各因素如何影响乡城劳动力流动也未能给出详细说明。尤其是这些理论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很好地说明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即大量乡城转移劳动力的“流而不迁”。这充分说明有必要提出专门针对“中国路径”的乡城劳动力转移理论,即“二阶段转移理论”。并且,鉴于中国目前第一阶段的转变已无障碍,而第二阶段的转变仍步履维艰,因此研究重点应放在后者,即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上,而且特别强调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即构建“二阶段转移理论”,并利用该理论去研究业已出现代际分化的农民工的市民化。

尽管如此,在乡城移民研究的大主题下,相关理论仍为分析此“中国路径”提供了大量借鉴。例如,科普曼斯等(Koopmans et al., 2005)从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角度为研究移民融合提供的概念和方法工具集,斯切尔普等(Schierup et al., 2006)在移民与福利问题间构筑的桥梁,让·塞巴斯蒂安等(Sébastien et al., 2007)对移民与劳动市场整合展开的分析,波茨和德温德(Portes and DeWind, 2008)对近期移民研究在概念、方法和理论上进展的梳理等,都对研究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有参考价值。

中国的王春光、李培林、蔡昉、李强等大量学者都对“中国路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主题下,关注农民工群体分化的学者也有不少,如从职业分层结构、就业的所有制分层结构、收入分层结构对农民工分化进行考察的李培林(1996);从横向(职业位置)、纵向(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两方面对农民工进行内部划分的唐灿和冯小双(2000);将农民工分为“离土不离乡”的在乡农民工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的陆学艺(2002)和杨思远(2005);把农民工分为进城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和失地农民工的刘传江(2004);依据经济实力将农民工分为三类(经过打拼在城镇立稳脚跟,能与普通市民分享城镇文明的少数人;位于城镇社会生活和劳动就业底层,以临时打工谋生为特征的人;从城镇返乡的人)的白南生和何宇鹏(2003)。

近年来,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对于应将其划分为几代、划分标准是什么,争论一直比较大。例如,吴红宇和谢国强(2006)将农民工按照年龄划分为三代;邓大才(2008)以初次外出打工的时间为依据对农民工进行代际划分。通过对“代”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详尽探讨,王春光(2001)、刘传江(2005)等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概念被学术界广泛接受。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则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官方提法。国外的近似研究

则包括贝尔济莱和波拉茨(Belzil and Poinas, 2010)对法国第二代移民教育和职业的分析,波茨等(Portes et al., 2009)对美国第二代移民适应性的研究,汉马斯德(Hammarstedt, 2009)对瑞典第一、二、三代移民流动和收入状况的分析,阿尔甘等(Algan et al., 2009)对法国、德国和英国第一、二代移民经济状况的比较等。鉴于“中国路径”的特殊性,它们的借鉴价值有限,但仍在思想方法上具有启发性。农民工早已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其内部差异以代际分化尤甚。他们在个人特征乃至行为选择方面的代际分化,使得原本即为一个动态过程的农民工市民化现象更为复杂。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认为需要在构建中国乡城劳动“二阶段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大样本调查数据,对其展开具体深入的实证分析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研究。

■ 1.2 本书的选题价值、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

1.2.1 本书的选题价值

本书作为作者分别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批准号:7097309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城镇化战略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批准号:10CJL035)的最终研究成果,其实践价值在于:首先,把握在个人特征乃至行为选择方面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有关市民化的不同政策诉求,能够提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两代农民工会由于个人特征方面的不同,在行为选择上表现出差异,这尤其体现在劳动供给行为方面,而由此决定的生存职业流动又同他们各自的迁移流动行为(即空间地域流动)、身份定位行为(即社会阶层流动)互相影响,进而影响了两代农民工乃至农民工整体的市民化进程。这意味着,同样的外部制度可能在两代农民工那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要提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就必须将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分化作为研究起点,尤其关注逐将成为农民工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政策诉求。其次,测量和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预测农民工整体的市民化进程变化趋势,能够提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不应仅仅指向当前,更应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趋向。鉴于第二代农民工将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对其市民化从影响因素到具体进程展开研究,有利于降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制度成本,提高政策的效率。

在本书的学术价值方面:首先,“二阶段转移理论”的提出,有助于突破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经典理论对中国实际情况解释力不足的局限,说明和解决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即大量乡城转移劳动力的流而不迁,也为说明两代农民工涉及该问题

时呈现的种种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乃至劳动供给行为进行微观分析,并注意到由此决定的生存职业流动同他们各自的迁移流动行为(即空间地域流动)、身份定位行为(即社会阶层流动)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两代农民工乃至农民工整体的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能够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设计开辟新的重要思路,使相关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更具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1.2.2 本书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基于课题组以前的研究思路,拟突破传统的乡城劳动力一阶段转移理论对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路径”不能有效解释的局限性,建立“二阶段转移”的乡城劳动力转移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因代际分化而具有不同个人特征的两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受制度性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在劳动供给行为选择即生存职业流动方面出现的不同,及其和迁移流动行为选择(即空间地域流动)、身份定位行为选择(即社会阶层流动)的交互影响,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的影响。此外,构建测量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数理模型和指标体系,根据模型、指标体系和农民工调查数据,测量和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预测农民工整体的市民化进程变化趋势,以此提出促进其市民化进程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为达成上述目标,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处于乡城劳动力转移“中国路径”上的农民工。该部分描述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当代的乡城劳动力转移,比较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政策型转移”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诱致的市场型转移”两条乡城劳动力转移道路,针对第二条道路提出“二阶段转移理论”,引出在这种“中国路径”上不断壮大和分化尤其代际分化的农民工群体,通过统计检验和数据比较,总结两代农民工各自的主要特征。

(2)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分析之一:劳动供给。该部分以实证方式分析了农民工的过度教育与收入效应,提出虽然两代农民工是在许多个人特征上具有重要差异的群体,但在劳动市场上,他们面临同样的就业困境。究其原因,农民工所处劳动市场的特殊性应当被考虑,而该市场的需求方、供给方(即农民工本身)以及第三方(即政府)在此过程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结合个人特征分析,该部分给出了两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模型,并分析了其均衡对“民工潮”与“民工荒”的意义。

(3)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分析之二:迁移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在从“民工潮”转向“民工荒”的过程中,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变,而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工荒”的新趋势则再次检验了两代农民工的差异。该部分